

流研究型大学,提高基础研究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中的比重,向少数高水平机构提供充足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打破研究型教育、技工教育、职业教育及培训之间的藩篱,实现技术工人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升。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质量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

(三)抓住绿色发展机遇,应对环境挑战并实现持续增长。鼓励绿色发展,不仅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还将促进相关上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要建立鼓励绿色发展的长效市场激励机制,完善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取消对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提高污染税,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用地指标交易、环保生态标识、生态服务补偿计划制度。制定强有力的环保和排放技术标准,为每年大约1万亿人民币的政府采购引入绿色标准。加大对减少污染、保持和恢复生态系统以及与气候风险管理相关领域的公共投资力度。将支持绿色增长的明确指标引入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加强地区间协调,以便更好地管理区域性交通、自然资源和污染控制设施。

(四)通过就业、融资、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均等的便利条件,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同时采取三方面的措施。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关注农村和贫困儿童的早期营养和教育,实行农村高中免费教育,让更多的人获得可负担的中等教育。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和“无缝”连接,采取措施缩小社会保障待遇的省际差异。继续扩大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镇其他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覆盖。最后,动员公共和民营、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改革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关键产出进行有效的绩效监督;增加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

(五)加强财政体系建设。今后20年财政改革有四个关键领域。一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现有支出项目的效率,减少非优先项目(如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加大社会和环境公共投资比重。二是优化政府收入结构以满足预算支出需求,包括提高对能源、资源和污染的税收,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征收房地产税等。三是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有选择地将卫生、社保等支出或筹资责任上移到更高层级的政府,建立透明的规则管理省对县、市的转移支付,允许地方政府审慎地扩大预算内借款,确保各级政府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四是加强政府财政管理,提高公共开支效率,包括将所有公共收支全部纳入预算,公布所有预算收支,使预算和开支周期同步,加强政府项目的绩效评估,强化国库管理、账户管理和现金管理,监控或有负债情况,进行财政可持续性分析。

(六)主动利用多边框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使中国与

世界形成互利共赢关系。今后20年中国要继续加深与全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以获取更多的技术、更广的投资机会和更高的资本回报。为此,中国要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以积极的态度推动重启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要继续推进金融开放,稳步开放资本账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进而使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更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国际援助等全球治理,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可预见性,更好地发挥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的作用。

要确保六个领域改革的最终成功,需要建立中央坚强领导下的部委、地方、公众间的协调协商机制,加强经济社会风险的管理,处理好应对短期问题和实施长期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

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与世行合作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其研究成果就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进行深入探讨,既总结了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有利于各国分享合作成果、交流发展经验、谋划未来发展,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定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如何推动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提振各国信心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姚里程、刘伟杰、钱江南执笔)

深入推进区域财金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2011年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继续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区域财金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在全球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亚洲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各国推进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加强,区域财金合作迎来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各国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和经营力度加大,中国的周边局势和区域合作形势更为复杂,推进区域财金合作的任务更加艰巨。面对新的形势,财政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大力推动东亚财金合作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财长会机制下的经验交流、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继续推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的有关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务实成果,巩固和提升了中国在区域财金合作中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动东亚财金合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在此形势下,东亚经济体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区域财金合作、增强危机自救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区域财金合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东盟与中日韩(以下简称10+3)财长会机制在建立和完善区域危机救助和预防机制、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以及探索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重要进展。

(一)完善以清迈倡议多边化为基础的区域危机救助和预防机制。2003年10月,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经过10+3各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2010年3月24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生效,总规模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建立,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为进一步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应对危机的能力,2010年5月举行的10+3财长会决定对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有效性进行研究。中国与日、韩、东盟等国密切沟通协调,就货币互换金额的确定、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等问题积极研提意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1年5月举行的10+3财长会审议通过了《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有效性操作指南》,指示将研究扩大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危机防范功能作为财长会后各方的重点工作,主要涉及在东亚地区引入危机防范功能的必要性、区域危机防范功能的基本框架和有关具体设计等问题。10+3财长会后,清迈倡议多边化工作组就扩大危机防范功能的必要性和基本框架等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截至2011年底,10+3各方已就扩大危机防范功能的必要性以及扩大储备库的资金规模、提高储备库资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项目的脱钩比例、延长贷款期限和增强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经济监测职能等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为下一步磋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推动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启动运转。为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实施,增强本区域自身的经济监测与分析能力,2009年5月举行的10+3财长会决定成立区域经济监测机构(后命名为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在非危机时期进行区域经济监测,在危机时期为储备库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及监督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2010年,10+3各方就办公室的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主任选聘、法律形式、预算分摊等各项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就成立办公室的法律文件即章程协议展开磋商,并启动办公室主任选聘工作。2011年1月,办公室章程协议正式生效。

确定办公室主任人选是2011年上半年10+3财长会机制下的一项重点工作。中方推荐国家外汇管理局前任副局长魏本华参与竞聘。财政部与外交部、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密切协调,积极工作,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研提主任选聘方案,妥善解决各方竞争,推动10+3各方在4月举行的财政央行副手会上就中方候选人魏本华和日方候选人根本洋一共同当选办公室主任的“1+2”方案达成共识。根据该方案,在首任主任的三年任期中,中方任职第一年,日方任职第二和第三年。

2011年5月,办公室当选主任魏本华应邀首次出席了

10+3财长会和副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魏本华提交的办公室2011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对其当选办公室主任表示欢迎,期待办公室尽快招聘到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启动运转,建立经济监测能力并不断提高经济监测质量,希望办公室加强与各成员国及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同时在经济监测上保持本区域自身的独立性。考虑到办公室目前的法律地位是在新加坡成立的公司,各方表示愿积极合作,推动办公室尽快升级为国际组织。

5月财长会后,魏本华主任赴新加坡就职,启动了办公室人员招聘、建章立制和机构能力建设等一系列工作。2011年12月,办公室向10+3财政央行副手会提交了首份经济监测报告,得到各方的普遍肯定。

(三)进一步落实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由泰国于2003年在10+3框架下提出,其宗旨是发展本地区债券市场,促进亚洲储蓄投资于亚洲,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2008年,10+3财长会通过了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新路线图,明确将促进本币债券发行、促进本币债券需求、改进监管框架、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四个领域作为工作重点。中国积极参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下的各项合作,并推动有关合作倡议取得重要实质性成果。

在促进本币债券发行方面,2011年的工作重点是推动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筹建工作。基金的主要业务是为10+3国家的公司发行本币债券提供担保,增强信用等级,降低筹资成本。继2010年正式宣布基金成立、通过基金章程、召开首次出资人大会和董事会后,2011年,财政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密切联系,推动基金管理层招聘等筹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果。10月初,基金首席执行官和首席风险官宣布就职,正式启动了人员招聘、商业计划书及风险管理框架文件制订等工作。

在促进本币债券需求方面,第六届亚洲债券市场会议于2011年11月14日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会代表共同讨论了区域债券市场的未来发展等议题。会议为政府主管部门与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改进监管框架方面,2010年5月举行的10+3财长会同意建立10+3债券市场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探讨促进跨境债券交易监管标准融合等问题。论坛于2010年9月启动。第一阶段主要工作是整理和分析各国债券市场结构、债券交易和监管方面的信息等,同时加强各国政府官员与私营机构的交流。第二阶段计划就共同债券发行、区域信用评级合作、产品信息格式标准化等问题开展研究。截至2011年底,论坛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形成了10+3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和基础设施现状报告。

在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区域清算中介技术工作组对建立区域清算中介的有关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估。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下的合作,10+3各方在2011年系统梳理了亚洲债券市场倡议近年来的合作成果,围绕有关国家提出的改进版新路线图进行了讨论。

(四)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财金合作,在中国的提议和推动下,2010年

5月举行的10+3财长会决定建立“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工作组”，对东亚财金合作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具体建议。2011年，中方继续大力推动10+3各方就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推动5月财长会决定下一步就区域基础设施融资、自然灾害风险保险和区域贸易本币结算三个领域开展研究，其中，中方与印尼、马来西亚联合牵头区域基础设施融资研究。2011年12月初举行的10+3财政央行副手会讨论通过了各项研究的中期报告，指示工作组下一步就相关合作建议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 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效率不断提高。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是10+3各方讨论区域及各成员宏观经济形势，并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及区域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对话每年举行2次，一般在4月和11月前后举行的10+3财政央行副手会上进行。2011年4月举行的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重点听取了日方关于日本“3·11”地震海啸和核危机事件对日本经济和产业链的影响、日本政府灾后重建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内容的介绍，各方就应对通胀压力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政策措施进行了专题讨论。12月初举行的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围绕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提交的首份经济监测报告进行了讨论。

(六) 在中日韩和东亚峰会框架下各有侧重的开展合作。在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三国财政部建立了从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到工作层的多层次财金对话合作机制，为三国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10+3财金合作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2011年，中日韩三方合作更为紧密，中日、中韩双边协调进一步加强。8月初，受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影响，东亚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三国财政副手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强调将加强合作，维护地区金融市场稳定。年内日本和韩国副财长先后多次来京，就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区域财金合作热点问题与中方交换意见。

在东亚峰会机制下，2010年5月首次举行了东亚峰会非正式财长会。2011年，财政部配合外交部就有关国家提出的东亚峰会财金合作建议积极研提意见，同意在各方有共识的情况下于2012年举行第二次东亚峰会非正式财长会。

二、积极参与 APEC 财长会机制下的各项合作

APEC 财长会议是中国面向亚太地区开展区域财经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重要平台，对中方开展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交流与对话、参与和促进成员经济体财政金融部门能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2011年，APEC 财长会重点讨论了全球经济增长与再平衡、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融资、绿色增长等议题。

在加强 APEC 经济体财金部门能力建设方面，财政部积极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和研讨活动。2011年，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以普惠金融、政府债券市场、地方债管理、清洁技术投资等为主题举办了多期主题培训与国际研讨会，通过邀请国内外高级别政府官员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参与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交流，扩大了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影响力。

三、继续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开展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成员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不断深化合作，在交通运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能源等重点领域取得了多项务实成果，为推动中亚地区经济持续复苏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财政部作为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牵头单位，积极协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交通部、铁道部、海关总署等中央部委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方项目执行区，稳步推进交通和环境改善、口岸改造等项目，有力促进了中亚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2011年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机制建立10周年，各方系统回顾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立10年来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审议通过了指导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未来10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0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明确了未来10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目标与领域，为进一步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吕 霞执笔)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新时期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举措，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4月1日在伦敦会晤时对外宣布建立，着重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分别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取代、不重复、不削弱两国有关部门现有的其他对话与合作机制，对其他合作机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并引导其他合作机制配合衔接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分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中方外交部负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总协调。外交部和财政部分别牵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前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在华盛顿与北京轮流举行。中美两国多位高级别官员参加对话，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多边财经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话达成多项务实成果，进一步推进了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为推动中美关系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正确方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2011 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积极开展财经合作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互利合作空间巨大。然而，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出现分歧和摩擦。特别是在2011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